

『言文一致』

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

郭勇◎著



人民出版社

海外借

『言文一致』

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

郭勇◎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怡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郭勇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

ISBN 978-7-01-017310-8

I. ①言… II. ①郭… III. ①汉语-语言理论-研究②汉语-语言学史-
近现代③汉语-关系-文学-理论研究 IV. ①H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1437号

“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

YANWENYIZHI YU ZHONGGUO WENXUE GUANNIAN DE XIANDAI ZHUANXING

郭勇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380千字 印张:24.75

ISBN 978-7-01-017310-8 定价:75.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为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语言观的兴起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的结项成果
江南大学基本科研计划成果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言”“文”考辨与现代“文学”观念的萌生	23
第一节 中国近现代“言文一致”的本土与域外资源	23
第二节 “文笔之辨”及其流变	46
第三节 五四前后的“言”“文”论辩与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	61
第二章 语言 / 文字“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变革	88
第一节 汉字进化论与进化文学观	93
第二节 文法问题与文学语言的科学化取向	132
第三节 文字革命与文学革命	158
第三章 口语 / 书面语“一致”与现代白话文学的创立	189
第一节 白话、国语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	191
第二节 现代白话文的口语化取向与书面化走向	244
第三节 公共话语视阈中的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	265
第四章 文体变革、重写文学史与新文学的经典化	284
第一节 文体格局的重设与“中国文学”设想的提出	285

第二节 重写文学史的话语权力意识	314
第三节 《中国新文学大系》与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	348
结 语	366
参考文献	372
附录“言文一致”重要事件编年	378

引 言

语言和语言观念的变革，往往影响到文学和文化的变革，特别是在思想文化发生激烈变革的时期，语言与语言观变革的重要性就尤为突出。因此，本书力图从语言入手考查文学的特性、文学与语言和语言活动的关系等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剧变，而中国的思想文化也由此开启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是以文学革新为变革的先导，而文学革新又是以语言变革为突破口，“言文一致”则又是语言变革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这一命题本身是在中国近现代语言变革大潮中提出来的，倡导者们是将语言文字的革新作为变革思想文化的基石与前提，但恰恰是在对这一命题进行分析、讨论以及提出种种方案并付诸实践的过程中，“言文一致”溢出了语言文字变革的范围，不仅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也成为文学革新与思想文化转型的突破口。

从这个意义上讲，至少在晚清至“五四”时期，语言问题成为文学革命和文化革新的契机。通过对于汉语、汉字和语言观念的反思，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和文化观念得以建立。在具备现代品格的中国文学研

究中，现代语言观被引入其中，这就是中国文学观念中语言意识的现代生成。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与其语言意识的现代生成可说是同步的，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言文一致”是最为重要和显著的标志。这一命题的提出及其围绕它展开的各种论争，正是中国文学观念现代性的标志之一。

然而，恰恰是这一极其重要的命题，其本身的含义却含糊不清、众说纷纭。一是因为论者在提及这一命题时很少加以解释说明，直接将其作为不言自明的理论假设；二是“言文一致”中的“言”“文”“一致”，本身就存在着多种理解的可能；三是这一命题还有其他的种种表述。因此，清理这一命题的发展流变与多重内涵，就是本书的首要任务。下面具体论述：

第一，现代意义上的“言文一致”的提出。学界一般将此首倡之功归于黄遵宪，依据便是他的《日本国志》。但黄遵宪本人只是提到“语言、文字合而为一”，又通过小说说明“语言、文字几乎复合矣”，提到文体变革“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他并没有明确提出“言文一致”这样的说法，所以说他是“言文一致”最早的倡导者，当是后人的总结。不过，黄遵宪的主张已经涵盖了近现代以来“言文一致”命题的主要内容和解决方案。

第二，中国古人也没有“言文一致”的说法，但这种观念却是古已有之。先秦时古人就“言”“文”发表过不少见解，而到了汉代王充，则就言文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陈钟凡、罗根泽、郭绍虞等学者就认为王充已有“言文一致”的观念。^①唐代刘知几、明代袁宏道、袁

^① 陈钟凡、罗根泽、郭绍虞等学者依据的主要是王充《论衡·自纪》篇中的观点。1927年，陈钟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王充有“文言一致”的观念。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罗根泽也认为历史上最早倡导“言文一致”的是王充，在他看来，王充“对于创作文学，内容方面主张‘实诚’的表现，形式方面主张‘言文一致’”。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也于1934年出版，他认为王充“以口语为文词，遂与近人所倡文学革命之说颇相接近了”。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但郭绍虞直到1964年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的时候，才正式提出这是王充主张“言文合一”更准确说是“书面语言与口头语统一”的证明。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135页。

宗道对“今语”的重视，也可归入此类。^①

加以追溯，可以发现《周易》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②，庄子所论“书不过语”^③，都已经包含了对于“言/文”关系的思考，只不过是以“言/书”“语/书”的表述出现。因此，“言文一致”其实是与“言意之辨”同时被提出来的。

第三，自晚清以来的“言文一致”观与中国古代有着历史的联系，但也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二者虽然都是在“言意之辨”的大背景下提出的，都同时牵涉到语言、文学、哲学与文化的方方面面，但是前者还与中国人现代意识的萌发、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密切结合在一起，是在世界（基本上就是指西方）/中国、现代/传统的二元对立框架中进行艰难的抉择。中国的“言文一致”观念是受到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影响，以西方为取向而形成的。但是由于中国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最终完成了本土化的语言、文学与文化变革。

第四，“言文一致”是基于“言文分离”的前提而提出来的，无论是“言文分离”还是“言文一致”，“言”与“文”本身的含义就十分丰富而复杂，但在这一表述中它们是作为相互对应的概念而出现的，故而又有着较为明确的指向性，大体可以归为三类：1.“语言”与“文字”，而其物化形态又演化为“语言”与“文章”（文、书、典籍等）这一对概念；2.“口语”与“书面语”；3.“白话”与“文言”。第一个方面涉及的是语言与文字两大系统，第二个方面则深入语言内部，第三个方面则进一步深入书面语的内部关系。

第五，实现言文“一致”的途径、要达到的程度，学者们意见也各

① 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言语》中强调运用“今语”的重要性：“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亦惑乎？”袁宏道的《雪涛阁集序》也讽刺今人作古语者“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袁宗道在《论文·上》中还进一步解释了要重视今语、口语的原因，即“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转隔碍，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分别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第205、196页。

②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2页。

③ 郭庆藩：《庄子集释》（中），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88页。

不相同,主要有这样几种:1.强调“言”,要求“文”与“言”一致。2.强调“文”,要求“言”与“文”一致。3.“言”“文”互渗融合而实现一致。前两者都多少凸显了言/文的二元对立并带有强制(强行要求一个完全屈从、并入另一个之中)的意味。这第三种方案具有辩证的色彩,显然更为合理和可行。^①

与之相联系的,是“一致”所要达到的程度,有两种意见:一是言文之间缩小距离,互渗融合,达到相对的一致;二是言文完全合为一体。虽然一些论者将后者视为理想蓝图,但无疑前者才符合实际。^②

① 在口语/书面语问题上,无论是“国语”还是后来的“普通话”,都是以口语为基础,在吸收古白话、文言、外来语元素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语言/文字问题上,拼音文字的主张未能实现(万国语、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等均告失败),但是汉字却实现了简化和规范化。在白话/文言问题上,现代白话居于主导地位,但也吸收了古白话和文言的优点。而文言在当下也仍然是一种可以使用的书面语。

章太炎曾著文批评“俗士”的“言文一致”论和“妄人”的“文言一致”论。在他看来,前者正是以“言”为主宰,强使“文”与“言”一致。后者则相反,是以“文”为主宰,强使“言”与“文”一致。他认为二者均为偏颇而不可取,真正合理的途径是以方言为本。参见章太炎:《论汉字统一会》,《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争(1906—1911)》,《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李春阳:《20世纪汉语的言文一致问题商兑》,《中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孙风华:《章太炎“言文一致”思想的基本内涵》,《汉字文化》2013年第5期。

② 胡适主张“言”“文”合为一体,但主要是从口语/书面语的角度立论。他的白话文学主张,实际是认为口语与书面语可以完全一致。1915年9月的诗中写道“要须作诗如作文”,1919年提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都是这一主张的体现。见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7、128页。但是1918年朱我农在致胡适的信中认为“笔写的白话,同口说的白话断断不能全然相同”,已经体现出对这一主张的反思。见朱我农致胡适信,《新青年》5卷2号“通信”栏,1918年8月。五四知识分子更多的是主张在“言”“文”互渗融合的基础上实现言文一致。如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就文言和白话关系问题而提出“言文合一”,刘半农是从自身的语言经验出发,认为文言白话各有优长,故而废文言不宜也无法操之过急,他所说的“言文合一”是指白话、文言的合一,由此生成一种新型语言。钱玄同在《〈尝试集〉序》中也认为“制定国语,自然应该折衷于白话文言之间,做成一种‘言文一致’的合法语言”,这一层意义上的“言文一致”,与刘半农的主张基本一致。后来傅斯年版在《文言合一草议》中提出“文言合一”主张,认为“与其谓‘废文词用白话’,毋宁谓‘文言合一’,较为愜允”,要“文言合一”,则应“以白话为本,而取文词所特有者,补苴罅漏,以成统一之器”。见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67、105、121页。

从语言/文字立论强调言文合为一体的,主要是文字改革论者和国语运动者。钱玄同、

第六,除“言文一致”外,还有种种不同的表述,古人以“书/言”“书/语”指代“文/言”,此外有“言文合”“言文合一”“文言合一”“文言一致”“字话一律”“文话相通”“语文一致”“语文合一”等说法。^①这些表述有的意思基本相同,有的则差别很大,在后文的具体论述中将会加以细致辨析。

在大致辨析了“言文一致”这一命题后,可以再来看这一命题的提出及历来的研究情况。

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言文一致”是黄遵宪在《日本国志》

黎锦熙、傅斯年等主张废弃汉字而改用拼音文字就是如此,钱玄同更是进而主张连汉语一并废弃而改用世界语。

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追求言文的一体化,胡适和钱、黎等人却表现出了分歧:胡适认为废弃汉字不现实,“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绝不能变成拼音文字”。黎锦熙则认为胡适的主张不彻底,以至于在1922年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分别见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46页;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见黎泽渝、刘庆俄编:《黎锦熙文集》(下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①“言文合”是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来的,见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6—58页。

1917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到了“言文合一”。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也提到了言文合一。见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3、67页。

傅斯年的《文言合一草议》的提法是“文言合一”,见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一般而言,“文言一致”与“言文一致”含义相同,但也有极个别的例外,主要是按照“言”与“文”的排序强调排在首位的因素(“文”或“言”)的重要性。如章太炎对强调以文统言的“文言一致”论和强调以言统文的“言文一致”论都加以批驳。

晚清时卢懋章提出过“字话一律”和“文话皆相通”,见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见黎泽渝、刘庆俄编:《黎锦熙文集》(下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

“语文一致”:胡适晚年版在口述自传时,回忆自己当年在北大结识了“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一些会员,发现“他们都有志于语文改革;对‘语文一致’的问题,皆有兴趣。‘语文一致’的意思就是把口语和文学,合二为一”。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

“语文合一”:胡适在《国语文学史》开篇提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后来黎锦熙为该书作序时特意表明自己不同意胡适的意见:“战国以前,语文不但够不上说合一,而且够不上说分歧;后之所谓古文,在当时当然不以为‘古’,但也说不上‘活’——不是已‘死’,乃是并不曾‘活’。”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8页。

中首先提出来的，这部著作是黄遵宪自 1877 年开始动笔。他在比较中日文字之后认为汉字繁难而日文便捷，因而在使用、推广方面后者占有明显优势：“盖语言、文字合而为一，绝无障碍，是以用之便而行之广也。”黄遵宪由此表达了他的语言文字观：“文字者，语言之所从出也。虽然，语言有随地而异者焉，有随时而异者焉，而文字不能因时而增益，画地而施行。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①

如果说黄遵宪的观点止于此，那他所揭示的最多只是语言文字改革的重要性，但他的观念之所以在后来引起广泛的反响和呼应，是因为他把语言文字问题与民众素质、国之强弱联系了起来，这就具有了深刻的现实意义：“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当然，黄遵宪并没有一味悲观绝望，而是从文字衍化与文体演变的角度指出了希望所在：

然中国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夫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自凡将训纂逮夫《广韵》、《集韵》增益之字积世愈多，则文字出于后人创造者多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有孳生之字，为古所未见、今所未闻者乎？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②

由此来看，黄遵宪的“言文一致”主张，包含着这样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1）“言文一致”的提出是基于“言文分离”的现实。在他的论述中，“言”为语言，“文”为文字。黄遵宪认为当时的中国，言文处于分离状态。（2）言文分离的原因是汉语随时空而变迁，但汉字却有着

① 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07—809 页。

② 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10—811 页。

超时空的稳定性，因而中国的言文分离就不可避免。(3) 言文分离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就语文本身而言，其应用推广受阻；就社会而言，会造成民众素质低下、国家贫弱。(4) 解决言文分离的办法是文字变革和文体创新两条途径，即简化文字和使用浅易文体，而文体创新——使用浅易文体——又涉及书面语的变革。

联系晚清与“五四”时代的变革，黄遵宪触及了“言文一致”的重要方面，也提出了解决方案。第一点提出了问题，这是所有追求言文一致者都共同承认的一个前提；第二点指出言文分离的原因，为后来的国语运动和汉字革新运动的发动者所认可，成为汉字改革的理论依据。当然，黄遵宪只要提出字体改革，即简化汉字，而非改汉字为拼音文字；第三点也成为语文变革的理由，而且恰恰是在强调民众素质低下、国家贫弱这一点上，语文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第四点则开启了后来的汉字革新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

然而，黄遵宪的这些观念又包含着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首先，将言文分离的后果与民众的愚昧与国家的落后相挂钩，使语文变革和文学革新蒙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由于晚清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不是从语文自身的特性出发来探讨言文问题，而是出于启蒙的需要，内在设定的前提是中国/日本、西方的二元对立，中国代表的是古典，意味着落后，日本与西方代表的是现代，意味着先进。中国知识分子从启蒙出发，汉语与日语西语的对比自然被纳入二元对立之中，不是二者各有优胜，而是有了明显的高下优劣之分。要实现启蒙的目标，就必须改变言文分离的现状，实现“言文一致”，这是晚清知识分子的逻辑与思路。耐人寻味的是，这一逻辑与思路同样为五四知识分子所继承。

其次，将文字创新和文体变革作为解决言文分离的办法，就又出现了矛盾：如果说文字创新是为了使文字与语言一致，那么文体变革呢？黄遵宪以小说为例，指出的却是书面语与口语的一致。这就使得“言”“文”的含义溢出了语言和文字的范围，指向了“口语”与“书面语”^①。此外，由于文言长期占据着书面语的主导地位，因而晚清与五四

① 1897年，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裘廷梁指出：“因音生话，因话生文字。”

白话文运动所追求的“言文一致”就表现为以白话推翻文言，成为一场书面语的变革运动。在这场变革中，文学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往被视为“俗”文学的小说、戏剧地位得到提升，特别是小说跃居中心位置，体现出文学雅俗观念的根本变化。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晚清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探讨“言文一致”问题的两条思路：语言变革（落实为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与汉字改革（主要是拼音化运动）。前者是在语言的层面上运作，后者则涉及文字问题。也就是说，“言文一致”主要包括口语与书面语的一致、语言与文字的一致两方面。而这两方面可以归结为“言说”与“书写”的一致。因为言文“背离”或是“一致”，都不是就口语与书面语、语言与文字自身而言，而是人在运用语言文字的过程中所作出的评判。这是从语用的立场出发的。此外，“言文一致”也被认为是白话和文言的一致，但是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持这一观念的学者认为，白话和文言之所以能够而且应该一致，是因为白话必须吸收文言的优点，文言也可以吸收白话的优点，折中二者，最终形成一种新的语言——但这种新型语言必须是以白话为本且最终要取代言文的地位——这种新型语言，正是新文学所需要的。但是他们是把白话视为口语，将文言视为文字或者说是书面语，因而这一主张同样可以归入口语与书面语的一致这一方面。只是这一观念显然有问题，因为白话并非口语，文言也非文字，而文言在口头也未必完全不能应用，文言与白话的界限也不易确定。

文字者，天下人公用之留声器也。……苍颉、沮诵，造字之人也，其功与造话同。而后人独视文字为至珍贵之物，从而崇尚之者，是未知创造文字之旨也。”他又说：“文字之始，白话而已矣……后人不明斯义，必取古人言语与今人不相肖者而摹仿之，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邹国平、黄霖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7页。裘廷梁所说的“言”、“文”既是指口语与书面语，又是指语言与文字。梁启超也是如此，他一方面指出“古代之言即文也，文即言也，自后世语言文字分，始有离言而以文称者，然必言之能达，而后文之能成”。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8页。另一方面他却意识到言文分离不仅意味着言语与文章或者说书面语的分离，也涉及语言与文字的分离：“抑今之文字，沿自数千年以前，未尝一变，而今之语言，则自数千年以来，不啻万百千变，而不可以数计。以多变者与不变者相遇，此文言分离之所由起也。”梁启超：《〈沈氏音书〉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晚清与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于“言文一致”的看法错综复杂，言/文对立在论述者那里化为不同的二元对立：语言/文字、言说/书写、口语/书面语、口语/文章、白话/文言、俗/雅，但是在晚清与“五四”，言文分离却被当作是不证自明的前提，而“言文一致”也就成了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

从晚清延续的阮元的“文笔之辨”、梁启超发动的“三界革命”、“五四”文学革命，我们可以理出一条时隐时现的脉络。事实上，这一条脉络也一直未曾断绝，反而时不时出现，引起新一轮的文学和文学观念变革：黄遵宪提出的语言文字合一、卢戡章的“字话一律”、劳乃宣和王照的“言文一致”、胡适、陈独秀、钱玄同所推崇的“言文合一”、20世纪30年代“大众语”运动、40年代关于文学的“民族形式”的论争，等等。甚至到当下，这一问题依然能引起学界和大众的关注与争议，如郑敏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尖锐批评^①、持续到新世纪的中学语文教育问题、简化字与繁体字之争、汉字规范化问题等，都触及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的深层症结。

至此可以说，语言、文学与文化在“言文一致”这一命题上发生了紧密的关联和互动。本书即是以“言文一致”为研究的中心对象，通过对这一命题历史进程的梳理，所涉及各方面问题的探究，探讨在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语言观念的变革是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学和文学观念的转变。

二、研究概况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国内学界还没有就“言文一致”这一文化命题展开系统的研究，但是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总体来看，“言文一致”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角度：

^①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1. 语言学视角。黎锦熙指出,自20世纪初至30年代,“国语运动的口号不外两句话:‘国语统一’、‘言文一致’。当国语运动的第一期(引者注:他是指1900年以前的切音运动时期),那些运动家的宗旨,只在‘言文一致’,还不甚注意‘国语统一’。……就说言文一致,也不过是要用一种‘切音’的工具,来代替那繁琐难写之单个儿的汉字,却没注意文体的改变”^①。这是语言学家对于清末民初“言文一致”的理解。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语言学家力图从语言学理论出发,对言文一致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1944年,吕叔湘在《国文杂志》第3卷第1期上发表了《文言和白话》一文,对“言文一致”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究,他认为这是指“口语”和“笔语”的关系问题,并认为“要是指绝对的一致,那是古今中外都没有过的事”。因此,只能是相对的一致。吕叔湘从语言和文字(书面语)的区分谈到“口语”和“笔语”的分别,“笔语是否完全和口语符合呢?这就是所谓‘言文一致与否’的问题”。在他看来,绝对的一致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语调、书写工具、语言的变动性等因素。因此,吕叔湘强调,对待“言文一致”的态度要灵活:“要是是一个社会里头一般应用是以语体文为主,我们就说它是言文一致;要是通行的是超语体文,我们就说它是言文不一致。”^②

1950年5月4日,《光明日报》刊载《吴玉章为五四纪念谈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吴玉章在谈话中指出,“要想打破文字和语言分离的障碍,达到言文一致,若仅仅在文学上革命,而不在文字上革命,是没有用的”。他强调汉语应以北方话为标准,文字则应采用拉丁化新文字。^③吴玉章是着眼于文字改革谈“言(语言)文(文字)一致”的问题。

1986年,张中行完成了《文言和白话》,在第十二章“白话与口语”

①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见黎泽渝、刘庆俄编:《黎锦熙文集》(下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

② 吕叔湘:《文言和白话》,原载《国文杂志》1944年第3卷第1期,收入《吕叔湘全集》(第七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69页。

③ 转引自费锦昌主编:《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129页。

中，他也提到了“言文一致”这个“大问题”。他认为这里的一致是指“口说的音节和手写的文字保持一对一的关系”，但他所谈的则是口语与白话的一致，因为他是专门从书面语的角度来谈白话的。与吕叔湘不同，张中行认为这种一致是可能的，但又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口语始终与书面语有距离，他进而探究了“难于一致的原因”及白话“距离口语的一般情况”。

他认为，“言文一致”是个大问题，“有应该不应该一致的问题，有可能不可能一致的问题”。自中古时代起，白话作品取得独立地位，就会碰到这个问题。但因为当时文言和白话和平相处，所以不存在冲突。白话照口语写，这是“实际上”应该一致。“五四”文学革命，“他们心目中的一致是‘道理上’应该一致”。“一致”是“口说的音节和手写的文字保持一对一的关系”，这是可能的，但又难以一致，“写在书面上的都与口语有或近或远的距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口与笔的不同、修改或修润、学文不学语、口语的庞杂、现代白话的欧化句法、粉饰造作的文风等。因此，张中行实际指出了言文难以一致，而他认为这种不一致并非坏事。^①

2. 思想史视角。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考察了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及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联。他有感于现代中国思想研究经常忽视了科学共同体及其文化实践，以至于把新文化运动仅仅看作是人文知识分子活动的产物，因而着手考察“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形成，结果发现“科学话语构成了民族主义话语的有机部分，它对‘理’、‘公理’的强调在某些情形下甚至直接演变成为一种民族—国家的观念”，因而“不是白话，而是对白话的科学化和技术化的洗礼，才是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更为鲜明的特征”，他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现代日常语言、文学语言和人文话语都是在科学话语的实践中孕育成熟的，也是以科学化作为变革的方向和理由的”，当时的文学研究其实是一种“科学工作”，“在中国现代初期的文化语境中，科学话语不仅不是人文

^① 张中行：《文言和白话》，《张中行作品集》（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173页。